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施春来

奇迹背后的举国体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奇迹背后，我国特有的举国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制保障和体制优势。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我国的举国体制根植于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中，与民族文化基因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状况，在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国计民生、科技进步等重要工程、重大项目上采用举国体制并取得巨大成就。聚全国科技核心力量，依靠中国人自己力量，创造了“两弹一星”史诗般奇迹；举国聚力进行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奠定了中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也奠定了我国今天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分工体系重构中具有自主、稳定、安全可控的产业韧性基础。回望过往，全国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的举国体制，是与新中国建国初期资源匮乏、基础薄弱、人才短缺的国力初始条件相适应的，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道路的创造性探索。客观而言，曾经的举国体制比较依赖政府的行政动员及集中计划调配能力，比较少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因素纳入决策视野，比较容易导致资源要素配置模式的僵化固化，影响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影响创新驱动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改善和进化。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从国际上看，科技创新引发国际分工重大调整，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一些科技大国利用拥有的科技先发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环节对中国科技进步“卡脖子”，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试图阻断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探索新时代我国科技进步的制度安排，探寻我国新阶段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方式，建构破解我国科技发展关键难题的战略路径，具有鲜明的现实逻辑。

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既要贯彻国家意志，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也要维护和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的需求导向作用和效率牵引效用。国家重要的前沿基础研究既需要政府统筹基研10年规划、统筹部署核心基础研究资源投入，建设国家实验室，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也需要鼓励采用“揭榜挂帅”“英雄不问出身”，动员全社会基础研究精锐资源加盟。在适宜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科技创新细项目或细分领域，应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和自主性，激发全社会科技创新力量和热情，汇集涓涓细流成大河大海，是新型举国体制应有“新义”。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更加凸显新型举国体制需内嵌全球化和开放创新特征。不仅要重视自主创新，也要重视开放创新，重视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的国际融合；不仅要在科技全球化合作创新中提升中国科技创新的全球水准，更要在前沿科技突破的全球引领中维护好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从“嫦娥工程”的稳步前进到“中国天眼”的落成启用，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布局到“天宫”“天问”深远太空硬核科技的重大突破，“国之重器”缤纷呈现，彰显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

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加快科技创新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内涵。

聚焦原创性原生性的国家创新策源能力至关重要。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在一些领域还有一定现实差距，关键在于原创性引领性的基础研究突破。从强化持续性的基础研究规划、基础研究投入到高端科技和产业高端人才队伍，都需要战略科技力量的举国储备和举国精准部署，从点线面到关键全领域实现创新策源能力的系统提升。要全面提升各类创新主体的能力，培育一大批世界级领军企业，鼓励更多企业开展原创性研究，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形成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世界级科学研究中心。

聚焦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强大至关重要。国家创新体系是决定国家创新发展水平的基座，国际科技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创新体系整体能力比拼。从科技创新发展规律视角，“卡脖子”核心问题并不简单地是某个学科或专业的难题，并不简单地是某个技术瓶颈或是某项产品的创新，而是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链发展的整体运行机制和系统性能力问题。所以，不但需要解决具体项目或产业的技术瓶颈，更需要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持续孕育激发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潜能潜力，构筑强大国家创新体系的底座力量；更需要发挥和尊重市场规律与运行趋势，在促进科技创新体系和高端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上探索新路，加快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构建雨林生态式的全社会科技创新氛围。

聚焦国家科技创新全球合作的国际软实力至关重要。自主创新从来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要面向全球全方位推进科技开放合作，推进各类创新资源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我国经济和科技硬实力日益崛起的过程中，理性发出中国科技进步的声音，展示中国友善的科技强国方案，方能赢得世界对中国科技力量和科技创新贡献的信任、尊重和接纳。犹如上海成功举办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所展现的润物细无声和射电望远镜FAST对全球开放的胸襟，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构建“科技进步共同体”的叙事软实力，强化我国科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科技发展的故事。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知识链接

新型举国体制

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其特征是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并综合运用行政的和市场的诸种手段，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

从全球知识生产链到全球知识价值链：

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

■陈恒

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是知识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这里所讲的学科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欧美学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结晶，代表着当今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类的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认知。学术体系既指有关学科本质、属性、规律、概念、方法等方面成体系的知识和系统的理论，也指宏观的学术精神，即时代精神，一个国家的学术总体反映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话语体系则是知识、理论、概念的高度概括表达，是学术体系是否成熟的表现，是学科服务国家、服务民族的具体体现，是学术话语影响力的外在表现。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受时空限制，是阶段性的，又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问道有先后，认知有高低，先进未必永远领先，后进未必长远落后。我们不但要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准，而且也要积极学习域外智慧，学会扬弃，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不但要积极构建当代中国三大体系，更要系统梳理人类认知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经验，加快发展速度；不但要认清自身的不足，也要客观评价取得的成就，胸怀世界，海纳百川。唯如此，才能对人类知识活动做出有效判断。

知识是人类活动的精神遗产，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知识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及其形成的体制、机制，这门学问叫知识史。知识史就是研究以人为中心的各类知识形成、发展与嬗变的一门学科，它不仅叙述各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研究知识的感觉价值、功能价值、精神价值以及绝对价值等。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国学术建设事业全面系统的工程，涉及人类认知的各个方面，归根到底都属于知识生产的范围，是如何看待知识与时俱进的问题。

知识生产既涉及培育与研发平台，如学校、科研机构、实验室、学会、智库、公司等；亦涉及发表与传播平台，如出版社、文化机构、学术期刊、宣传手册等；也涉及转化与宣传平台，如互联网、电话和电报、报刊和邮政、戏剧和电影、广播和电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由此可知，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可以一气呵成的事，也不是哪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长期坚持下去就可以完成的，是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持久战”。在我看来，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就是学术界的“一带一路”，是学术基建项目，强调的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放眼的是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版图中的位置。

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其说知识是“客观的”，不如说那些获得广泛接受地位的知识是有说服力的，是那个时代比较准确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先前具有说服力的“客观”知识也许不再具有说服力。时间自然会完善知识，社会发展自然促成新知，知识中的意识形态偏见也会被逐渐剔除。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美国学者布劳特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从字面上说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它不仅是一套信条，而且是一大批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模式、一个构件整体；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套高超的理论，是许多历史、地理、心理、社会逻辑和哲学等次级理论的总架构。这一超级理论就是文化传播主义。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自己也承认，他极具影响力的《西方的兴起》根深蒂固于“一种（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中形成的文化传播概念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

由此可知，一方面，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西方社会扩张的历史，是将世界各地不同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的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被施压、被强迫，有时甚至是被收买，从而形成与这个体系价值观和结构相一致的认知与知识。知识与政治密不可分，也时常与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福柯、萨义德等人作品的影响，开始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提出新的问题。

另一方面，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是为了理解、呈现社会变革、嬗替的过程。时代变了，我们需要新的知识。全球化引起了人们对区域内地理和社会文化异质性的关注，在这个时代，理解世界仍然需要理解地方的特殊性，即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广义的文化和地方的动态互动。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破除以往知识研究的偏见。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需要新的知识研究，新的知识研究要破除以往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也要破除特定的知识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同时，要确立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新知识体系。

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更需要宏观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这个平台在当下最急迫的就是学术期刊建设，中国要根据自身实践推动理论创新，要在理论上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需要在知识体系上实现突破，就必须创办大量的有话语权、能引导学术发展潮流的杂志。

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7万种学术期刊，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为学术同行评议期刊。这些学术期刊按数量多少排序的国家依次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认定的学术期刊有6449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有2400余种）。按出版社排列依次为荷兰的爱思唯尔、德国的斯普林格、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美国约翰·维利，上述四家所拥有的学术期刊都在一千种以上。可见我们的学术期刊总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有的期刊数量、类型、分布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求。

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比，数字时代的知识有更多特征：从生产角度看，知识更加自由、平等、包容；从存储看，知识更加丰富、开放、共享；从分享看，知识更加公共、互联、无偿。我们必须在数字时代做好充分准备，打下坚实基础，倡导学术的开放存取，避免形成新的南北学术鸿沟。

知识兼具意识形态与学术属性，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需要提升中国社会对知识这种看似无形之物的认知和重视。中国要加强软实力建设、实现全面复兴与富强，需要加强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的知识产品要走进世界，要让世界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国，需要提出有说服力的知识体系；设立有关世界各地知识生产信息追踪的智库；需要尽快筹建“域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研究中心”；积极对外开放大学职位；营造环境，大力吸引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人才来中国定居、任教，从而激活中国知识生产的潜力，提升学术原创能力。

响应时代要求，对应国家需要，必须在学科宏观规划上下功夫，实施优势学科计划，制定2035/2050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宏观战略规划。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同时，要反观西方学科体系的发展路径，既要了解其形成过程，又要了解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应答什么样的问题中不断丰富、不断拓展、不断走向世界的。大力发展“外”字打头的学科，尤其是世界史、区域国别研究。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我们要推进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引领全球化，使用各种办法，塑造良好环境，培养大学问家、大战略家，引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谁掌握了知识生产权谁就掌握了文明解释权，不断的知识积累一定会带来文化的突破。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系教授）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在城市发展经脉中延展『大党建』格局

■马西恒

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始终与城市改革发展的脉动同频共振，注重在解决发展新问题、服务民生新需求上体现成效，不断探索践初心、担使命的新理念新办法新模式，不断延展“大党建”格局。这中间，有三条鲜明的历史脉络生动演绎了党与人民同行的内在逻辑，佐证了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在机理。

以服务群众为重点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的企业改制、城市建设全面铺开，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居民就业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保障民生、化解矛盾的重心明显落到了社区。1997年6月，上海决定探索社区党建新模式，把基层经验提炼成“凝聚力工程”加以推广，将服务人民、团结群众、凝聚人心的工作落实到了每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身上。由此，服务群众成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点，也成了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的中心和主线。

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先后创造了“一线工作法”“三访三服务”“组团式服务”等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机制，做实了党的上级组织为党的基层组织服务、党的基层组织为党员服务、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为群众服务的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着力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基层党建工作从联系服务群众向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拓展，致力于整合力量补齐治理“短板”。基层党组织在家门口服务、“五违”整治、城市更新、治理创新上全面发力，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体现了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

以组织创新为基础

服务群众就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的社区党建有一个独创之处，即把社区建设的空间单元放在街道层面上，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面向市场、社会新领域，按照属地原则加强基层党建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社区党建因此沿着三个维度展开：一是纵向到底，加强居民区党组织建设；二是横向到边，扩大“两新”组织党建覆盖；三是面向流行性社会，探索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新方式。

党的十六大以后，针对许多“两新”组织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情况，一些街道逐步找到了“支部建在楼上”这把钥匙，开辟了“两新”领域党建全覆盖的新路。为做好流动党员和白领群体工作，上海自2002年起推广建设党员服务中心。这些开放式、社会化、专业性、多功能的党建服务平台大大增强了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面向新领域、新业态、新技术，不断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和运转方式。楼组党建、互联网党建、产业链党建、毗邻党建、功能型党支部等探索异彩纷呈，各级党群服务中心以党建带群建促社建，使党的组织活力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跃脉络同频共振。

以治理创新为抓手

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单位体系之外的公共空间不断拓展，越来越多公共事务需要在这个空间中通过多主体协同进行处理。这要求城市基层党建既要广泛布点，也要横向结网，通过各类基层党组织的互联互通凝聚起多元主体的共治合力。中共上海市委在1997年推行社区党建伊始就将其界定为“区域性党建”，居民区与周边单位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街道牵头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成立社区党建联席会，在当时即普遍展开。

2004年底，上海着手推行“1+3”街道社区党建新体制，对区域内党组织进行分类整合。2010年世博会之后，正式推行驻区单位党组织向街镇报到、在职党员向居住社区报到的“双报到”制度，以此带动区域化党建从街镇层面向区县层面拓展、向居（村）层面延伸。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率先探索社会治理由“管”向“治”转变，把基层党组织工作定位从传统的大包大揽调整为“价值引领、组织动员、支持服务、统筹协调、凝聚骨干”，同时着力搭建党组织引领的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强化了自下而上的议题选择、项目决定机制。2014年底，上海启动新一轮街道社区党建体制机制的调整优化。如今，上海16个区全部建立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90%以上居村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或兼职委员制度。市、区、街、居党组织四级联动，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体制、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支撑。

“凝聚力工程”“支部建在楼上”“区域性大党建”等经验先后在全国推广，其中体现的既是上海各级党组织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作用的智慧担当，更是我们党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始终把群众路线作为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鲜明特质。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党建引领人民城市建设

■金信烨 董德兵

在人民城市建设中，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切实转化为城市建设的政治优势，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才能确保人民城市的建设质量。

科学规划城市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在保证城市规划科学性中主要发挥四方面的作用。一是确保城市规划的正确方向，确保城市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充分汇集民智。运用民主集中制决策城市规划，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听取党内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听取人大、政府、政协的意见，充分听取被规划企事业单位、建设方、管理方等城市规划密切相关方的意见，充分听取市民群众的意见；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群龙无首、无人拍板的局面，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三是科学合理决策。党委统筹领导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能够协调的资源最多，掌握的信息最全，能够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通盘谋划城市规划。四是监督保障执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规划经过批准后要严格执行，一茬接一茬干下去，防止出现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的现象。

集中建设城市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在人民城市建设中，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能够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作为大事来办，通过重大项目的实施保障和实现人民利益；能够借助完备的组织架构实行政治动员，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集中各方面力量、各方面资源来办大事；能够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团结动员凝聚群众开展城市建设，引导全社会参与城市建设、担负起城市建设的责任。

有效治理城市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基层治理面对最广大的群体、最复杂的矛盾、最具体的问题，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最多最重，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核心是强化和巩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要推进党在城市的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党建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网上治理与网下治理深度融合，有效解决壁垒问题，实现党的组织功能、组织优势、组织力量的最大化，提高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和居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